

# 新四民與中國政治文化重建： 廣西個案研究 1860—1937

• 朱宏源

## 前 言

中國近代的歷史，是一段中國人在遭遇內外巨大壓力當中受難、求變的故事。今人多以「變遷」、「變革」、「轉型」、「改革」、「發展」、「演化」、「進化」、「開發」、甚至「革命」的字眼，來描述這個時代的特色<sup>①</sup>。這種說法，為相當部分的學者所接受。

可是，也有另外一批學者研究發現，中國是個老大得不得了的国家，她的政治文化盤根錯節，變成某種「超穩定的結構」<sup>②</sup>。中央研究院就有一批學者，以與前者類似但不全同的觀點，投入研究中國各個地區在1860年以來的變革軌迹<sup>③</sup>。

但是後一派學者認為，前者的基本假定犯了認知上的錯誤。例如「傳統—現代」說，把西方看作今日文明的起源，把西化當作現代化，將各地古老傳統當成落伍陳舊，終而認為西化就是現代化的普遍模式。這些論點的「最大缺陷是不能理解東方社會現代化道路上的多樣性」<sup>④</sup>，並進一步舉例<sup>⑤</sup>：

日本和中國幾乎是同時在西方衝擊下由傳統向現代轉變，但為何日本可以採取西方模式，而中國卻變成社會主義國家？……東方國家在近現代變遷中獨特的文化，社會組織方式顯然被忽略了。

柯文(Paul A. Cohen)曾經帶頭呼籲：歷史學者在研究中國近現代史時，應以中國社會本身為中心。換言之，學者要從「西方中心觀」跳出，改採「中國中心觀」<sup>⑥</sup>。這種觀點得到金觀濤等熱烈回應，並進一步提出所謂中國社會的超穩定結構，背後即預設了中國本身存在着雄渾的自主力量。不過，金觀濤和劉青峰在新近出版的著作中另外加上「一體化」的說法，以較細膩的方式來描述「超穩定結構」<sup>⑦</sup>。他們融會「傳統一體化」，並建立「新一體化」的看法<sup>⑧</sup>，深為本文作者所贊同。但是，這並不表示作者與金、劉的研究方法與途徑相同，而是

由於結果的相一致。以下，作者要以過去十年研究廣西的心得，採納新近出版的一本專刊之中所用的「新四民」分析法，進一步對以上說法加以鋪陳<sup>⑨</sup>。

士、農、工、商這種四民結構，在過去兩千年的中國社會中沒有太大的變化<sup>⑩</sup>。但到了近代，由於蒸汽機、火車、汽船、輪船、飛機的發明，加上電的發現與利用，促使知識的傳遞躍進另一個時期，加大其擴散的速度與範圍。知識的蓬勃發展，使整個社會產生了結構性的革命，造成政治、社會、經濟與文化四大面向的大改造。更重要的是，這種變革更直接瓦解了傳統「士一農一工一商」這種過於單純的人口結構。

在我對廣西個案的研究中發現：由於商人急增、農民數目急速下降、工人的組織強化，再加上資訊隨交通廣布，知識得以自由流通，遂有新四民的出現。因此，現代國家人民的結構，已不再以傳統的四民來劃分，而應以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四大面向所涉與所分類的四種人口來取代。由於這四種人都具有相當程度的知識與教育，所以他們絕大多數算得上是「士」人。因此，人民不再以階級而是以職業作區分。這種政、經、社、文各面從業人員在數量與質量上的遽變，為近代社會走入现代化的首要特色。之所以如此，是由於教育發達。

此外，作者更視現代化為一體，認定政、經、社、文之變遷，乃係此一整體變遷的各個不同面向，而非四個相異的領域。換言之，社會中的任何個人，其專業雖然分隸某一面，但是既然生活在社會之中，自然就會涉及其他的三大面向；任何一面的變化，必與其他的三面相牽連。

落實一體四面分析法的途徑，是以職業分類為原則的分工分析法。歷史演化至近代，由於社會日趨複雜，每個人不能同時從事四大面向的工作，分工在所必需。從工作的觀點看個人，又似乎可將之分為政治人、經濟人、文化人以及社會人<sup>⑪</sup>。這四種人在數量、訓練、認知等方面並不相同，對社會所發揮的力量也因時地而異。但要使社會和樂圓融，就需要這四種力量互相制衡<sup>⑫</sup>。

現代國家人民的結構，已不再以傳統的四民來劃分，而應以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四大面向所涉與所分類的四種人口來取代，遂有新四民的出現。由於這四種人都具有相當程度的知識與教育，所以他們絕大多數算得上是「士」人。

## 傳統四民結構的解體：清朝後期的廣西

中國自先秦以迄清朝，文化人的數量在總人口之中所佔比率十分之小。以明、清兩代的進士為例，在統治近300年的明朝只有23,000人；統治近270年的清朝也只有27,000人<sup>⑬</sup>。即是說，這段時間的中國，每年只產生不到100個進士，而地處偏僻的廣西，其中試率更可想見。

在明朝，廣西有進士173人，在清朝則有570人，數量均很少。不過，其中試比率隨時間的演進而有明顯增加。何炳棣指出，在明朝，每百萬廣西人中有40人中進士，低於貴州的42人；在清朝則達90人。其錄取率在全國各省的排名，明朝時為第18名，也就是18行省中的最後一名；到清朝時則攀升到第12名<sup>⑭</sup>，優於河南（第13名）、湖北（第14名）、廣東（第15名）、陝甘（第16名）、湖南（第17名）、安徽（第18名）與四川（第19名）<sup>⑮</sup>。人口較少、產量較低、交通亦落後的廣西，其文風日盛，由此可見。

在一個穩定的環境下，文化人會激發社會的創造力；但在一個人力資源供需失調的社會，他們就會滿腹怨氣與不滿。由於文化人有把怨氣與不滿理論化的本領，並且也能構築一個不甚可行但卻具說服力的「新境界」，所以一旦時機成熟，文化人中言論與手段均激烈的一群，便會與若干政治人聯手，攻擊並摧毀統治當局，以求開創新局面。洪秀全、石達開等人在1850年開始作亂，領導大規模的叛亂就是最好的證明。

不過，在統治結構基本未變，其合法性仍然穩固的十九世紀，絕大多數的文化人仍然追循傳統的既定程序，以求上進。同治以來，在劉長佑等歷任巡撫推動之下，廣西教育的成效似頗顯著。同治十二年(1873)，廣西鄉試的投考人之中，竟有25人的年齡在80歲以上(其中8名超過90歲)<sup>⑯</sup>！光緒年間，單單陸川一縣應童子試的人數，就高達1,800人<sup>⑰</sup>，可見桂省文風在清末日盛。依此推算，光緒初年廣西的就學人數每年應已超過數萬人。換言之，到了十九世紀末，廣西受過文化教育的人口至少有數十萬。

在文化力逐漸形成的同時，其他三種力量也有變化。此時廣西的社會力已經蛻變：首先，在制度方面，土司制度逐漸瓦解，土司的子女漸成佃農；其次，在結構方面，原為農奴者受到解放，他們必須找尋新的出路；再次，組織方面，新的職業形成各色各樣的會社，貧富的懸殊與土地的佔有造成大批貧民。這些貧民以方言相結合，平時結社互助，亂時成群入山為匪。

在經濟方面，成群結隊的游民進入廣西之後，租佃之風更盛，農地卻趨集中，但官方所登錄的耕地面積不增反降。這中間的差距，使移墾社會的經濟活動完全走樣，官方無法有效約制。到了道、成年間，經濟似已失控。貧農與失業礦工相結納，形成對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的強烈挑戰。於是，整體經濟陷入高度緊張的狀態，社會治安屢遭破壞。在這樣一個關鍵時刻，政治力量並未作出適當的調適。

政治方面，廣西省的高級官吏多以過客心態主政，而下層官吏亦少實心任事者，更糟的是文職人員非常之少。根據非正式統計，廣西政府的編制不及500人。政府官員人數這麼有限，平時只能虛應渡日；面對多事之秋，更容易形成文過飾非的作風。這種作法，不但於事無補，更助長社會力將廣西帶至暴亂的核心。

陸寶千研究兩廣的天地會，指出社會人(即「游離群」)的確具有較高的游離度：他們通常不識字、知識缺乏、營生無術，為了求生存，逼不得已只好違法犯紀。他進一步概括這四種人之間，沒有「森然嚴格階級」，「四群人眾可以互相轉化」<sup>⑱</sup>。這個結論無疑為傳統四民結構以及中國傳統社會組織三層次的結構解體，做了具體的見證，士、農、工、商的等差被打破了。

士不再有「士」的傳統地位，他們開始變成了「文化人」。到了清末，文化人的數量已有大幅度的增長。其地位雖比不上古時候的士，然而人數則甚多。另一方面，由於從商的人增加，再加上新興生產事業的企業主，在社會中遂形成新的「經濟人」集團。經濟人財力雄厚、人數甚眾，也有文化的陶冶，其社會地位與文化人不相上下，甚至更高。

傳統的士，通常學而優則仕，成為「政治人」。十九世紀末，政治人的數量

在劉長佑等歷任巡撫推動之下，廣西教育的成效似頗顯著。同治十二年，廣西鄉試的投考人之中，竟有25人的年齡在80歲以上，其中8名超過90歲！桂省文風在清末日盛。

並未隨人口的增加而上升，因此仍舊是少數的一群<sup>①9</sup>。至於農人，仍然是社會的最下層，所佔人數亦最多；他們與工人一起滑向邊緣，構成「社會人」。

新四民的社會組成結構，到了這個時候可以說具體而微，但仍不甚健全。直到進入二十世紀，教育改革普遍實行、新式教育成為事實之後，才得到蓬勃的發展。

## 新四民的形成：清末十年的急進階段

知識普及使文化人增多，也使其他三種人直接獲利。在二十世紀初葉短短的37年裏，廣西新四民的發展有以下三階段的變化。本節先述第一階段。

光緒二十七年(1901)五月，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會奏變法事宜，學校制度自此而興；同年，張百熙奏擬新式學堂章程。翌年廣西巡撫丁振鐸亦呼應學制改革運動，上奏提倡改制，將前任巡撫黃槐森奏准之體用學堂，擴建為廣西大學堂<sup>②0</sup>。1902年前後，各州縣書院開始改制，成為中西兼顧的學堂<sup>②1</sup>。廣西教育的現代化自此展開。光緒二十八年(1902)，小學初創。到了光緒末年，全省辦有小學的縣份，約佔74%。至清末民初，才普及全省。不過，這時期的的小學與私塾，實際上並無任何分別，只是名義不同而已<sup>②2</sup>。

中學教育方面，始於光緒三十一年(1905)的桂林府中學堂。從初創到宣統三年(1911)，全省共有16所中學。學堂設備亦甚簡陋，多由舊書院、考棚或廟宇修葺權充。高等學堂則更早於光緒三十年(1904)即已動工，建於桂林<sup>②3</sup>，惟並非當年新政的重點。當時桂省教育的重心，除小學堂外，以各種職業及特殊的學堂為主。女學亦很早在廣西推展，光緒三十年設校梧州<sup>②4</sup>，名曰：「珊萃女學堂」<sup>②5</sup>。

此外，按察使王鐵珊於光緒三十年創辦警察學堂，附屬警察總局<sup>②6</sup>，而師範講習社則於光緒三十一年次第開設<sup>②7</sup>。隔年於鎮安府極邊地區創學務公所，附以速成師範傳習所<sup>②8</sup>。俟師範生畢業，再以其充作該地兩等小學堂、土司學堂、蒙學堂的教員。

實業學堂亦為興學重點。光緒三十一年梧州知府擬設農業學堂<sup>②9</sup>，翌年該地士紳開設商業學堂<sup>③0</sup>、蠶桑學堂<sup>③1</sup>；原已開辦之農林試驗場，亦於宣統元年(1909)改為中等農業學堂。總計宣統元年廣西省實業學堂，中等者有3所，學生410人；初等者1所，學生49人；實業預科3所，學生132人；合計7所，學生591人<sup>③2</sup>。

除了以上各式學堂外，另有講武學堂<sup>③3</sup>、法政學堂<sup>③4</sup>、土司學堂等等<sup>③5</sup>，均於光緒末年、宣統初年興於桂省。要辦成各色各樣的學堂，得靠大量的人與錢。在人才與經費均嚴重缺乏的情況下，桂省官員可謂竭盡所能、挖空心思，希望在短時間內就能把新式教育辦起來<sup>③6</sup>。他們的願望，顯然難以達成。

培養中等及基礎人才，可在省內就地興學；培養高級人才，就必須求諸省外，甚至國外。留學他鄉，遂成風氣<sup>③7</sup>。日本於甲午之戰與日俄戰爭中擊敗中國與帝俄後，遂取代歐洲成為國人留學仿習的新對象。而仿習的科目，除了軍

光緒二十七年，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會奏變法事宜，學校制度自此而興。1902年前後，各州縣書院開始改制，成為中西兼顧的學堂。廣西教育的現代化自此展開。

備，更開始重視法政。光緒三十年，練兵處奏定章程，定額選派學生留日，廣西每年3名<sup>38</sup>。總計光緒三十四年(1908)至宣統元年間，桂省留日學生登記有案者，約60人<sup>39</sup>。實際人數恐怕還要超出此數甚多。這些留日學生親眼看到日本的富強，自思效法，對祖國改革的要求也因此大增，於是行諸文字。他們在東京創社，於1907年7月發行報刊，名曰《粵西》<sup>40</sup>。在此之前(1905年)，更有留日桂生馬和(君武)、鄧家彥等人加入同盟會，成為抗清的重要成員。除了留日之外，桂省亦遣多人留學歐美<sup>41</sup>。這些人返國之後，都成為文化界的主要力量：他們也參與政治事務，成為中國近現代史上影響頗巨的一批廣西人士<sup>42</sup>。

延聘日本及歐美教師至桂講習，亦不失為培養人才的可行方法。光緒三十二年(1906)廣西亦有許多學堂延請日本教習，以實習各種學科，兼尚武功<sup>43</sup>。中國延聘日本教習，以1906年(日俄戰後一年)為最多<sup>44</sup>。不過囿於語言的障礙，必須透過翻譯，但當年無翻譯人才，故而收效不大<sup>45</sup>。因此，最根本的解決辦法仍在自我培養。據張鳴岐奏報，光緒三十二年廣西所訓練畢業之學生有7,600人，三年後已增加到40,300人，較前約增六倍<sup>46</sup>。從以上各式學堂的成立以及人才的培養來看，廣西省已經孕育了十萬餘的新型文化人才<sup>47</sup>。不過，與全省800萬的人口相比，這些人才仍屬少數，在量方面仍舊不足；至於質方面，除了極少數外，他們大部分只有相當於今天小學或初中畢業的程度。

武學生方面，從振武學校返國的新軍官，也在廣西講武學堂訓練出一批活躍於民國政治舞臺的新式軍官，他們對於推動廣西、廣東甚至湖南、江西、安徽等省的現代化，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另有一批文學生，自日本、歐美留學

新四民之興起，實與教育普及有莫大關係。圖為當時學堂的師生合照。



返桂，多參與新政之推行，且相當多人加入革命組織。這些為數有限的文學生與新式軍人，成為辛亥首義之後，促使廣西響應革命的主力。

清廷推動現代化教育的結果，是促使其瓦解。從本位主義看，清廷可謂「自食其果」，但從整個國家向前推進的大角度看，則以西方為師的教育政策無疑得到了具體的成效。雖然當時廣西人民的識字率在5-10%左右<sup>④</sup>，但這個數字已足以令廣西積極而正面地回應新的現代化運動。不論是康有為在廣西講學(1894)<sup>④</sup>、公車上書(1895)<sup>⑤</sup>，孫中山的武裝及秘密革命，或者廣西新軍響應武昌首義等等，似乎都很容易就可以在廣西得到這群為數不多但受過文化熏陶的人的呼應。這說明了，當時採取政治改革手段來推行變革的人口，或是願意響應變革的人口，已經有相當的數量。

## 新四民的形成：民初的緩進階段

民國初年，廣西文化人口的膨脹進入第二階段。大約有17年的時間，廣西的文化教育工作進展比較緩慢，但仍有一定成績。例如中學教育，到了1922年左右，已有中學生3,938人<sup>⑥</sup>。若與今天相比，這個數字實在非常之少，但在當年資源匱乏的情況下，能在短時間內提供新式設備、教材、師資給4,000名「最高級」的學生，已是很不容易了。假使再與他省比較，廣西的畢業人數已較雲南(2,959)、河南(3,311)、安徽(2,208)為高<sup>⑦</sup>。

至於小學教育，到了民國十二年(1923)，廣西有小學生185,233名。與其他省份比較，高過雲南(181,611)、安徽(97,340)、福建(175,663)，且與湖北(216,843)、江西(213,709)相差不遠<sup>⑧</sup>。如果從小學生所佔人口百分比率來看，則更可觀。除了雲南(2.06%)、陝西(2.31%)、山西(7.20%)以外，其餘省份均不如廣西<sup>⑨</sup>。廣西省受教育兒童佔學齡兒童總數的1.70%，竟然高踞全國第九名。

廣西的職業教育，由於相關資源較缺，因此表現較差。在民國十五年(1926)時為全國倒數第六名，只有15所職業學校<sup>⑩</sup>。

留學教育方面，廣西的情況亦不理想。從民國十年到十四年(1921-1925)，各省公費生的定額有相當大的差距。在這五年中各省公費出國的人數，浙江有140人，江西有114人，廣東有111人，而廣西則只有18人。

整體來說，廣西省在人才培育上所作的努力，自民初到北伐完成這段時間內，已經有了初步的成果。據粗略估計，廣西在民國十六年(1927)的識字人口應有200萬左右<sup>⑪</sup>，識字率也從過去的5-10%提高到20%以上。

清末的文化人，熱衷於現實政治，而且很快就發生影響。民初的廣西文化人，在政治上只有陪觀的地位。他們在軍事強人陸榮廷的統領下，未曾產生像清末一般的廣泛影響。

不過，清末文化人之所以能對政治產生影響，時勢所趨是一個要因：在文化人與社會人以及部分政治人(新軍)聯合下，要摧搗人數比率最低的官僚系統中的政治人，並不是一件困難的工作。因為這個緣故，為數極少的舊式官僚及

不論是康有為在廣西講學、公車上書，孫中山的武裝及秘密革命，或者廣西新軍響應武昌首義等等，似乎很容易就可以得到廣西文化人的呼應。這說明當時採取政治改革手段來推行變革的人口，已經有相當的數量。

制度很快就被汰換了，不旋踵，「共和」的「招牌」即已高掛。不過，掛上新招牌並不就能讓大家走新路線；想要全體走出新路線，仍有賴文化人進一步的鼓吹與帶動，使全民一致，以實行民主共和。

## 新四民的形成：抗戰以前的黃金十年

民國十七年(1928)開始，國民黨在蔣中正等人領導下成為中國的執政黨。廣西因參與北伐屢建奇功<sup>⑤</sup>，在政治上躍居相當重要的角色，教育經費也因而充實起來，各級學校不論質與量均有顯著的改善，使廣西文化人的數目劇增。

民國十七年，是國民政府首次統領整個中國的一年。國民政府深信教育為建設國家之本，後來更制成政策，於隔年公布：「中華民國之教育，根據三民主義，以充實人民生活，扶植社會生存，發展國民生計，延續民族生命為目的；務期民族獨立，民權普遍，民生發展，以促進世界於大同。」<sup>⑥</sup>從此全國各中等學校，不論省立、市立、縣立或私立，皆得同一之方向。十年之間，普通中學自954所增為1,956所，師範學校自236所增至814所，職業學校自149所增至494所<sup>⑦</sup>。

龐大的教育經費是新桂系教育政策上的一大特色。財政素來入不敷出的廣西，自民國十七年起特別強調教育建設。十七年度的教育經費，佔全省收入10%<sup>⑧</sup>。據報載，當時先進諸國的教育經費比率，日本(1927-28)為8.22%，英國(1926-27)為7%，意大利(1926-27)為6.66%，法國(1927)為5.49%，而中國(1927-28)為1.70%<sup>⑨</sup>。此時，廣西以全省收入的10%為教育經費，用意是十分清楚的。

詳言之，廣西之所以大力興辦國民基礎教育，目的是希望借重軍隊的力量，透過國民基礎學校，組成龐大民團，動員全省的壯年與青年<sup>⑩</sup>。其動機、方法、手段都是政治性的。由於借重軍隊，而且正值內憂外患交侵，國際軍國主義、法西斯主義蔓延成風，再加上國民黨強調意識形態與黨治，使得具有濃厚價值判斷的軍事訓練，變成當時教育的核心。軍人與警察也因此搖身一變，成為教師，加入原即不足且不良的教育陣容中。推動者認為，如此一來，既能解決教師大量缺乏的問題，亦能令軍事教育(及政治教育)得以順利推展。

軍事教育的實施，並不限於廣西。民國十八年(1929)開始，教育部為便利全國高中以上學校進行軍事教育起見，曾與訓練總監部商定辦法，於該年5月通令各省教育廳及試行大學區制之大學，規定軍事教官擔任授課之時數，在大學以每週12-16小時為限；在高中及專科學校以每週18-20小時為限。學校軍事化似乎是當年中國政府決意大力推行的一項政策。

廣西推行軍事教育的熱度，甚至超過中央。中央規定高中以上才行軍訓，初中只能有黨童軍，但廣西並未照辦。廣西自初中即施行軍訓，可見其軍國主義化的意願比國府中央為高。廣西仿效的對象，是法西斯主義的起源地意大利與德國。白崇禧就曾強調：「意國之所以能夠像今天的強盛，全是由於慕沙里尼所組織之法西斯蒂黨的組織嚴密，同時全國尤其是學生都能軍隊化所致。」<sup>⑪</sup>

龐大的教育經費是新桂系教育政策上的一大特色，廣西之所以大力興辦國民基礎教育，目的是希望借重軍隊的力量，動員全省的壯年與青年，使得具有濃厚價值判斷的軍事訓練，變成當時教育的核心。

社會教育也是當年擴增識字人口極重要的一個政策。廣西省的社會教育，是與國民基礎學校密切配合的，同時又透過民團的組訓來完成。在民團後備隊訓練時，注重民眾的識字訓練及公民訓練。民團後備隊有多少隊員，社會教育的對象就有多少<sup>④</sup>。其社教經費，更與江蘇省(742,462元)相差無幾，達731,770元。因此，從社教經費在省教育經費中所佔的比率看來，廣西的22.3%竟是全國各省市之冠<sup>⑤</sup>。

表1 1911-1937年廣西中小學發展統計表

年 份	小 學		中 學		識字率
	所	人數	所	人數	
1911	1,500	6、7萬	20餘	4,000	90%左右
1928	7,000		40		80%左右
1937	24,000	170,000	90	20,000餘	50%以上

廣西的教育事業除了量的變化外，也有質的變化。當時各級學校的授課內容，主要包括基本文學、國家思想、軍事知識以及尚武風氣。於短暫的十年(民國十七年到二十六年)，特別是民國二十一年到二十六年(1932-1937)中，全省50%以上的人口受這一類的知識感染，對社會產生了重大的、多方面的影響。

在人口結構方面：此時文化人的數目較清季教育改革以前，驟增數十倍：若與民國十六年以前相比，也增數倍。他們與政治人，特別是其中的軍人聯合。政治人的數量，也因軍國主義、軍省思想、和對抗外敵的實際需要而擴增。

由於短時間內不可能請到這麼多具有完整高等教育程度的師資，廣西軍政當局乃動用部隊，把接受過若干現代軍事訓練的軍官，調為學校教師甚至校長，使教員不致匱乏。但軍人參與教學，無法持久，造成「現買現賣」、知識內容較淺的現象，使授課重點落在對時局的了解、意志的集中、戰志的提昇以及戰技的充實上面。

這種教育的結果，導致社會風氣的改變：廣西省在李宗仁、白崇禧、黃旭初三傑的強力軍事領導下，充滿了「尚武精神」<sup>⑥</sup>。在這種氛圍下，廣西人民顯得勤奮與儉樸。此外，社會亦瀰漫着經過「武裝」的三民主義與「三自政策」的意識形態<sup>⑦</sup>。於是，「軍省主義」的氣息籠罩了整個廣西。

普及教育加上地方自治，使社會組織、人與人的關係複雜化。一個人可以是文化人，同時又兼政治人、甚至軍人。在各個鄉鎮甚至村里中，部隊長官常兼任民團團長與小學校長，反過來，小學校長也多兼任民團的團長，甚至擔任地方行政主管的工作。因此，學校—民團—村里之間，形成「三位一體」的複雜關係。要兼任這三種職位，不但工作量過份龐大，而且教育只是第一線作業，在教育後面，其實還有政黨與軍方的因素：在這個時期，社會組織開始以政黨來連接，而政黨後面則是最具實力的軍方力量。在社會精英經過組織化之後，整個廣西的領導階層都被結構化了，教育因此淪為政治的工具。

廣西省在李宗仁、白崇禧、黃旭初的強力軍事領導下，充滿了「尚武精神」。在這種氛圍下，社會亦瀰漫着經過「武裝」的三民主義與「三自政策」的意識形態。於是，「軍省主義」的氣息籠罩了整個廣西。



由於由軍領政、由軍領黨、由軍領學，廣西的政治文化表面上充滿了軍事氣息；但是，桂系軍人在意識形態上，對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有高度的認同。為了實行三民主義，他們設計了上述的「三自政策」，並且誠懇地貫徹到基層。但因為桂系軍人的文化素養不高，所設計的政策深度自然不足，雖能使政策普遍化但卻有基礎不穩的現象<sup>⑥</sup>。

上述社會組織化程度提高，為廣西塑造了新的政治文化形態。由於政府平常就訓練人民操槍練武，並在民團中儲備人才，因而十年下來共訓練了33,000個幹部。在這些幹部的領導與配合之下，廣西軍事或政治動員的能力極高。民國二十五年(1936)5月，廣西只有不到兩萬的正規部隊，但在同年6月1日兩廣聯合發動「六一事變」時，卻能立即組成高達21個師及一個別動總隊的龐大陣容。在抗戰時期，廣西更徵兵百萬以上，為其他各省望塵莫及。

由於由軍領政、由軍領黨、由軍領學，廣西的政治文化充滿了軍事氣息，社會組織化程度的提高，為廣西塑造了新的政治文化形態，使得廣西軍事或政治動員的能力極高。

## 結 論

綜合以上所說，以及拙作《從變亂到軍省》的研究結果，廣西自1860—1937年，其整體以及文化人人口升降，以及所發生的重大事件中間，實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茲濃縮如下表：

表2 廣西近代人口及文化人數統計表

年 代	廣西全省人口	傳統漢學與新文化人數量	新文化人比率	備 註
道光三十年 (1850)	8,267,966	傳統漢學相當受重視，但已有若干新文化人，如洪秀全。	若干人，接近0%	太平天國革命在廣西爆發
咸豐十年 (1860)	8,041,016	傳統漢學相當受重視。	若干人，接近0%	自強運動開始
光緒元年 (1875)	7,921,780	每年有數萬人就傳統漢學，但新文化人(如唐景崧)緩慢增加。	若干人，仍接近0%	劉永福、唐景崧參加台灣民主國運動。
光緒二十四年 (1898)	8,175,557	約數十萬人曾受傳統漢學教育，但深知接受新文化極重要。	若干人，仍接近0%	廣西舉人99名響應公車上書，促成戊戌變法
1902	新式教育開辦之年			
宣統三年 (1911)	8,662,174	新文化人約十餘萬	約5%	廣西士紳、新軍、學生參加辛亥革命
民國十六年 (1927)	10,753,155	新文化人約二百萬	約20%	支持廣西第七軍率先北伐
民國二十六年 (1937)	14,047,618	新文化人約七百萬	約50%	廣西動員百萬人積極參加抗戰

資料來源：朱泓源：《從變亂到軍省》(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95)，附表一：〈廣西歷代戶口升降全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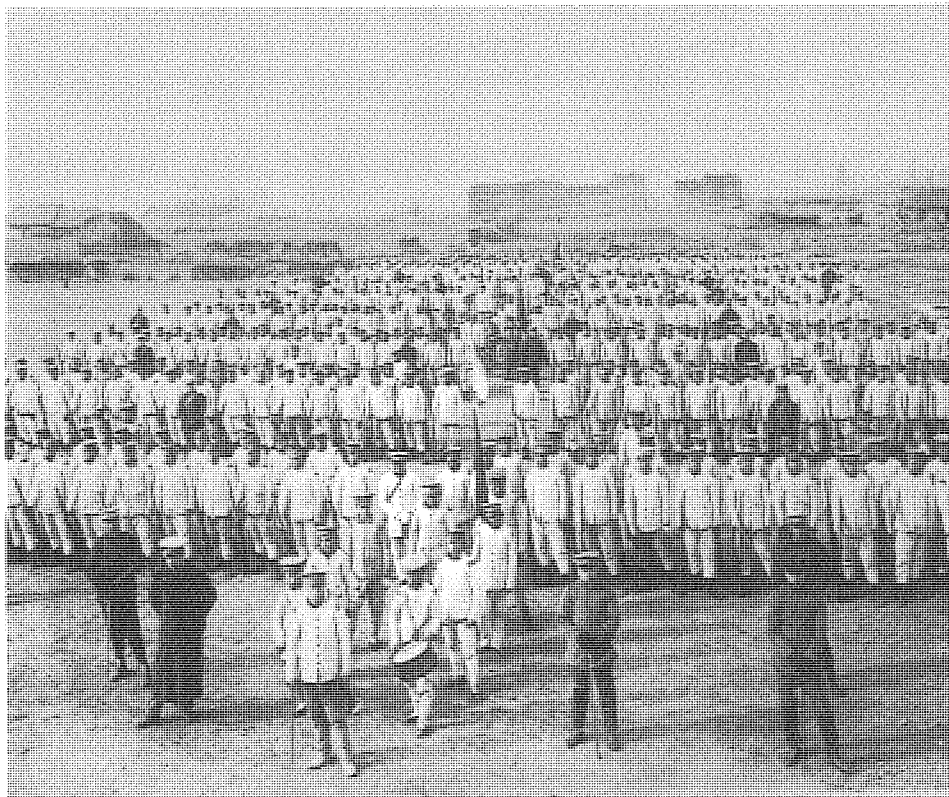
表中對於接受傳統漢學或新式教育人數的調查無疑相當粗糙，但基本上與實際情況應不致有太大的偏差。其中特別有趣的現象是這些新文化人的產生，恰與太平天國革命提出的神權國家、戊戌變法主張的政治制度變革、共和革命要求結束清廷的帝王統治、民初的新文化運動、以及抗戰前期的普遍武化運動，或者說法西斯化運動相連結。

先說清朝末年。太平天國、戊戌變法、共和革命，均係新文化人領導社會人向政治人挑戰的大型(太平天國)或中型運動(變法及革命)。他們強力的挑戰促使政治人自我檢討、整頓，後者為了有效壓制與管治，而不斷擴大其數量。因此，文化人與政治人(特別是軍人)的數量，遂在相互激盪中上升。相形之下，社會人及經濟人的數量相應減少。

民國建立之後，治安仍舊不良。但廣西幸而前有陸榮廷，後有李、白、黃的統治，社會尚算穩定。不過，國家整體的政治局勢並不穩定，因此使得軍人成為時代寵兒。自民初以迄大陸易幟，中國社會及政府的主要領導人都是軍人或者靠軍事起家的人。他們應時代的需要，出來統治各個省區，甚至統治全國。在軍人統治的這幾十年中，社會基本上十分不穩定，主要原因有二：一、由於內憂(軍閥傾軋)與外患(列強侵略割據剝削)；二、由於自由主義民主思潮的引入。

想要解決以上所說的不穩定問題，只有兩個辦法：內憂外患的問題，靠以軍人為首的政治人解決；自由主義思潮闖入的問題，則靠文化人解決。於是，文化人既要宣揚民主共和以打擊帝王專制，又要配合軍人以穩定社會秩序，還要傳道授業使更多人接受他們的新理念。這三大任務，彼此間有些是相合的，

自民初以迄大陸易幟，文化人既要宣揚民主共和以打擊帝王專制，又要配合軍人以穩定社會秩序，還要傳道授業使更多人接受他們的新理念。這三大任務，彼此間有些是相合的，但也有互相抵牾的部分。



廣西政府藉軍隊力量興辦國民教育，並取得一定成績，但卻使桂省的教育事業淪為政治的工具。

但也有互相牴牾的部分。例如：文化人為了共和民主，乃宣傳自由主義，倡導結社、集會、思想、言論的自由；但為了穩定秩序，卻又必須宣傳自我約束的習慣與作法。倡導自由的結果是走向多元，更會使群眾向主政者抗議；而自我約束，常導向一元化與自我設限。在30年代軍省主義的法西斯時代，自由與約束、多元與一致之間的矛盾是很明顯的。這種矛盾，一直潛藏在30年代的廣西，到日本侵略結束之後，問題才暴露出來。

由以上對廣西的個案研究，中國新政治文化的建設可以窺得一斑：從表2備註欄上的說明，可以清楚看到新文化人的影響力。新文化人一旦產生、有了組織，舊式的政制即開始受到衝擊。而衝擊的深度與廣度，全與新文化人的質量以及數量相密合。雖然文化人的作用偶爾會因客觀情勢的突變而有所變化，但是都屬權宜性的轉寰，俟局勢穩定，他們會再次發揮其影響。似乎，在新四民之中主導政治文化重建的，並不是體制內的政治人，而是體制外的文化人。經濟人與社會人則只站在附從的地位。

### 註釋

- ① John King Fairbank: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1800-1985*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6).
- ② 金觀濤、劉青峰：《興盛與危機——論中國封建社會的超穩定結構》(修訂本)(台北：風雲時代，1989)，頁227-32。
- ③ 張朋園：〈「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架構與發現〉，《近代中國區域史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86)，頁857-64。
- ④⑤⑦⑧ 金觀濤、劉青峰：《開放中的變遷——再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3)，頁23；23；38；38。
- ⑥ 柯文(Paul A. Cohen)著，林同奇譯：《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北京：中華書局，1987)。
- ⑨ 朱宏源：《從變亂到軍省：廣西的初期現代化，1860-1937》(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
- ⑩ 余英時認為「士、農、工、商」的階級，到了明清時代變成「商、士、工、農」的新次序。詳見余英時：《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7)，頁160-66。
- ⑪ 陸寶千早在1975年即提出中國社會有四階層的理論，與本說有異曲同工之妙(當然亦有差異存在)。他說：「吾人以為傳統的中國社會，若依個人在社會中所作之工作為標準，大體可分為四群：統治群—包括各級官吏。經濟群—包括從事農工商諸業者。文化群—包括士子、紳士等。游離群—包括脫離上列諸群之游民、流氓、僧侶及士兵等。」詳見陸寶千：《論晚清兩廣的天地會政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5)，頁133-34。本文所說的四種人，以專業的性質及程度的高低為標準。各種人所包含範圍如下：政治人—政治從業人、各級文武官吏。經濟人—生產者、企業者。文化人—知識份子，並以教育界人士為中心。社會人—專業程度低的社會大眾。參見 Chu Hong-Yuan and Elisabeth Maisonneuve: "The French and Chinese Revolutionary Processes Compared", *Word and Thought* (July 1989), pp. 182-93.

- ⑫ 王滬寧：《行政生態分析》（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9），頁45-120。
- ⑬ Ho Ping-Ti: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4), pp. 227-28.
- ⑭⑮ 另外加上八旗。八旗子弟最受優待，其錄取比重，每百萬人有130人，高居全國之冠。見註⑬，Ho Ping-Ti, p. 229。
- ⑯ 劉長佑：〈查明應試年老諸生〉，故宮博物院，軍機處檔，號112185。
- ⑰⑱ 《陸川縣志（民國十三年）》，卷9，頁3：4。
- ⑲ 同註⑰，陸寶千，頁134。
- ⑳ 政治人在廣西雖屬領導階層，但因廣西偏遠，從政的士人大多數不喜歡被分發到桂省服務。因此，政治人不但原本在編制上就相當小，而且還有許多官吏縱使被分發，也不願意就任。
- ㉑ 朱有璣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6），頁461。
- ㉒ 《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鑑》，丙：（一），頁454。
- ㉓ 《東方雜誌》，第一年，第六期，光緒三十年六月二十五日，教育，頁146。
- ㉔ 同上，第一年，第五期，光緒三十年五月二十五日，教育，頁124。
- ㉕ 同上，第二年，第十一期，光緒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教育，頁294。
- ㉖ 同上，第二年，第十五期，光緒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教育，頁347-48。
- ㉗ 同上，第二年，第三期，光緒三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教育，頁51。
- ㉘ 同上，第三年，第十二期，光緒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教育，頁204。
- ㉙ 同上，第二年，第九期，光緒三十一年九月二十八日，頁245-46。
- ㉚ 同上，第三年，第六期，光緒三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頁138。
- ㉛ 同上，第三年，第十三期，光緒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頁41。
- ㉜ 周談輝：《中國職業教育發展史》（台北：三民書局，1985），頁49。
- ㉝ 總辦蔡鐸，光緒三十四年六月開辦，宣統元年二月畢業。參見《政治官報》，號984，宣統二年六月二十日，頁9-10。
- ㉞ 預備立憲，首需培養法政人才。參見《東方雜誌》，3:11、4:3；《政治官報》，號167，光緒三十四年三月十六日、號977，宣統二年六月十三日等有關桂省法政學堂之報導。
- ㉟ 土司學堂為桂省特有之學堂，但成效不彰，於宣統二年停辦。見《政治官報》，號173，光緒三十四年三月二十二日，頁18、號1131，宣統二年十一月十九日，頁5-6；《東方雜誌》，5:6，頁145；以及《教育雜誌》，1:2，頁10。
- ㊱ 《政治官報》，號253，光緒三十四年六月十三日，頁7-8。
- ㊲⑳ 不著撰人，《近代中國留學史》，南京，民國十五年（台北：中國出版社，1973），頁195-200。
- ㊳ 《清末各省官自費留日學生姓名表》（台北：文海出版社），頁2、395。
- ㊴⑳ 汪向榮：《中國的近代化和日本》（台北：百川書局，1988），頁71；93：90。
- ㊵ 光緒三十四年有8人赴美（包括鄧家彥），學習農、礦、鐵道、銀行等科；有6名留法，習礦冶、鐵道；1名留德（即馬君武）習礦；還有1名留比，也習礦。《政治官報》，號253，光緒三十四年六月十三日，頁7-8。
- ㊶ 留日返國的陳樹勳亦被重用。見《學部官報》，99，頁4b-5a。
- ㊷ 《大公報》，光緒三十二年六月十八日（1906.8.7）。
- ㊸ 《政治官報》，號1018，頁11。
- ㊹⑳ 同註㉞，朱泓源，頁467：504。
- ㊺ 張鳴岐稱光緒三十四年全省各級學校及學生數目為專門學堂1所，學生346人；實業學堂7所，學生386人；師範學堂12所，學生1,464人；中學堂11所，學生1,440

人：小學堂676所，學生27,705人。合計707所，學生31,341人。參見張氏：〈第二屆籌備憲政成績摺〉，宣統元年九月二十三日。

⑤⑩ 公車上書由全國十八省603名舉人聯署，廣西一省的舉人聯署者高達99人，為全國各省之冠。

⑤⑪⑫ 《教育雜誌》，17:10，民國十四年10月20日，〈世界教育新潮〉，頁19。

⑤⑬⑭ 司琦：《中國國民教育發展史》(台北：三民，1981)，頁136。

⑤⑮ 僅較青海(2所)、察哈爾(4所)、貴州(8所)、綏遠(10所)、甘肅(10所)為佳，離第一名的江蘇(332所)甚遠。〈十四年度全國職業教育機關統計表〉(民國十五年5月製)，《教育雜誌》，19:3，民國十六年3月20日。

⑤⑯ 以民國元年(約有4萬名)到十六年(約有20萬名)，每年平均培養10萬名小學生計算，再加上清末原有的識字人口40萬。

⑤⑰ 朱法源：〈廣西與北伐〉，《中國軍事史評論》，期7。

⑤⑱⑲ 《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民國三十七年，頁1。

⑤⑳ 《上海民國日報》，民國十七年8月25日。

⑤㉑ *Life*, 4:30，轉載於《教育雜誌》，21:6，民國十八年6月20日，頁69。

⑤㉒ Diana Lary: *Region and Nation: The Kwangsi Clique in Chinese Politics, 1925-1937*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 p. 170.

⑤㉓ 白崇禧：〈從德意兩國的自強說到學校軍訓和體育〉，《一年來之廣西》(南寧：民國日報社，民國二十二年元旦特刊)，頁1。

⑤㉔ 此外，早期即設有民眾學校。二十年度時，校數為600，其中公立518所，私立82所，教職員1,248人，學生有35,000多人。二十四年度有615校，學生21,415人。另有補習學校，二十四年度有23校，學生4,362人。在這個年度其他的社教機關，如民眾閱報處，有348個；民眾識字處，有64個；民眾問字及代筆處，有490個；公共娛樂場，有2處；民眾茶園，有6所。

⑤㉕ 高於居第二名江蘇的17.07%，第三名天津的14%，第四名湖北的13.81%，以及第五名浙江的12.55%。《申報》，民國二十五年11月19日。

⑤㉖ 胡適：《南遊雜憶》(台北：啟明書局，1959)。

⑤㉗ 「三自」政策指的是自衛(民族)、自治(民權)與自養(民生)。

⑤㉘ 民初新式教育的成果之所以「基礎不穩」，主要原因是時間短暫。民初只有26年的時間，不可能把新式文化成功地在廣西紮根。所謂「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教育乃百年大業，26年不過是一段很短的時間，是成不了大業的；而「黃金」的十年，其實前後只有八年半，中間還夾了一個中原大戰，也不是一個「千足」的黃金時期。

朱法源 台灣大學政治學博士，現為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台灣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教授，專攻中國近代史。有《同盟會的革命理論》、《從變亂到軍省：廣西的初期現代化，1860-1937》等多種著述。